

书里书外

□傅光明

陈小滢女士是陈西滢和凌叔华夫妇的独女,今年91岁。我曾跟小滢开玩笑,说我一定上辈子欠下他父母一笔巨债,否则,便不会在1990年以25岁之韶华译完她母亲的《古韵》之后,又于2020年以55岁半老之身,来整理她父亲写给她的家信和日记。

整理过程中,我不时感叹,这批写于1943—1946年,连注释总篇幅达皇皇63万字的家信、日记,堪称弥足珍贵而又鲜活异常的“新”史料,是最富文采,妙趣的“西滢闲话”。透过它们,不仅可了解与鲁迅打过笔仗的西滢之真实为人,更可侧面了解与他密切交往的同时代中外各界人士:胡适,宋子文,宋美龄,晏阳初,费孝通,林语堂,李卓敏,蒋廷黻,顾维钧,王世杰,杭立武,李四光,熊式一,蒋彝,杨振声,萧乾,叶君健,李约瑟,罗素,汤因比等等,亦有助于从中寻觅那个时代国际政治交往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萍踪侠影”。

西滢写给女儿的信,每一封都有编号。而且,他有时会在信里嗔怪为什么妻子和女儿的来信不编号。这是个心细如发、时刻惦记亲人的丈夫和父亲。甭管多忙,他总会记着给女儿写信。这些信并不是一般的闲话家常,他会写在莎翁故居参观的见闻,写观看秀兰·邓波儿电影的观感,介绍英国的教育,介绍适合女儿读书的学校的情况,还会写英国大选,分析国际形势,也会偶尔谈及自己的工作。但身为父亲,最让他记挂操心的是女儿的教育。

有两天的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45年1月3日信,西滢写听到女儿报名从军后的心情:“我听了

书信日记里的陈西滢印象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
陈西滢 著
傅光明 编注
东方出版中心

这消息很惊奇,很受感动,也很自豪。你们这样小小年纪,便如此爱国,便这样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真是可爱。要是中国青年都有这种精神,中国一定振兴。要是中国人都有这种精神,中国一定强盛。”

1946年5月24日信,有这样一句:“姆妈能告诉你,我因写文章骂过人以至吃了不知多少亏。”他后悔当年与鲁迅的论争吗?有意思的是,西滢早在1944年5月22日的日记里便这样写道:“到东方学校的小图书馆,想找几本鲁迅的小说史略之类的书。”5月23日日记里记:“赵德洁为我借了小说史略等书。”次日又记:“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数十页。”5月25日记:“晚饭后看小说史略。”5月27日记:“看小说史略。”从中,我们能感受到西滢在回首1925年他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整大本的剽窃”的攻讦,但十分可惜,在此处西滢惜墨如金,没留下多余的话。

西滢日记再好不过地呈现出一个读书人生活和工作的貌相,他几乎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看报。早饭后去办公室,或出门办事。几乎没有一个中午没有饭局。这当然不是他喜欢公款吃喝,实在是因为饭店、餐厅是聊工作、谈事情的最佳地点。这也算英国的吃饭文化。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读书,看杂志或听时事广播。他的阅读范围非常广,英美作家的小说,各类著作,英美两国著名的报纸、杂志,如纽约《时代周刊》、伦敦《泰晤士报》。同时,他经常利用白天的空闲去博物馆参观,去戏院、电影院看戏、看电影。他是莎士比亚戏迷,他在日记中对现场看过《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理查三世》《皆大欢喜》《亨利五世》《约翰王》等莎剧都有记载,他还看过萧伯纳的不少戏。同时,他是超级好莱坞影迷,20世纪20年代到1946年的好莱坞电影,他看得相当多,而且,对许多演员耳熟能详。整理过程中做的许多注释,都是关于好莱坞电影和演员的。无疑,西滢日记可以丰富我们对那个时代好莱坞电影和演员的知识。

西滢身上有典型的英国绅士风范:富有学养、彬彬有礼、为人慷慨、关爱弱者、同情女性等等。虽说他担任着民国政府在伦敦的“中英文化协会”主任一职,收入并不很高,何况家有妻女,而且,当时国内货币狂贬,物价飞涨,但他一点不抠门,尽管自己买东西有时嫌贵舍不得花钱,请朋友吃饭却从不算计。除此之外,他还经常自掏腰包买戏票、电影票邀请朋友同看。日记中有大量篇幅记载着他请了谁谁吃饭,临时见到谁,也一并请饭:有不少篇幅记载着他提前买好戏票或电影票,在

戏院或电影院门前等朋友,结果朋友偶有失约。似乎他喜欢凑热闹,实则极不情愿应酬,而只想独自静心读书。

西滢是个洁身自好的好男人,孤身海外,身居要职,从无绯闻,实属不易。作为丈夫,他对妻子凌叔华之外的女性,从无非分之想。仅举一例。当时,在伦敦孑然一身的民国才女王右嘉与著名的清华才子罗隆基的夫妻感情濒临破裂。从日记不难判断,右嘉一定把西滢当成了值得信赖并能倾诉苦楚的朋友。西滢也一定表现出了十足的倾听的耐心,故此,才能在日记里留下这样的描述,1944年4月15日记:“她(王右嘉)说她自己脾气不好,努生(罗隆基)来信她没有看便烧了,是她的不是。他们十年夫妇,她不愿说长道短,如说努生错,努生不能辩护,如不说他错,那为什么要分裂?说到后来,她还是免不了把罗的过错举了些。他们同居八年,没有名分。他出去与女人玩,她要说话,他便说What right have you? (你们有什么权利?)他在天津时与一人的太太来往……这几年他说她可去北平。但她每次要去,他便吵闹,而且要动手打人。不是一星期一次两次,现在屋子小,多人同居,实在不像样。”

然而,令西滢没想到的是,他与右嘉交往密切,常在一起吃饭,却引来闲言碎语。日记中对此也有记载:他忽然感觉右嘉故意躲着他,而他竟傻傻的,不知何故。后来听说,是使馆的好事之人把闲话传回国内,国内遂把闲话造得仿佛真有其事,再传回伦敦。西滢没事人一样坦然面对。真君子也!

(本文节选自《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代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闲闲书话

最好的孤独

□王淼

人在书房,感觉最幸福的一件事是,被自己喜欢东西所包围。

多年以来,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书:买书,藏书,读书,写书……书之于我,乃是须臾不可分的伴侣,陪伴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落寞的日子——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书,我的人生还剩下什么,而我在书房中度过的,也是人生中最好的时光。

古人把书房称作“琅嬛福地”,想来还是颇有些道理的。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读书与写作固然已是常态,但也有很多时间是在与书的亲密接触中度过的——放下这一本,拿起那一本,一本本地赏玩,一本本地摩挲,反反复复,不忍释手,不知不觉就消磨掉一个下午,一个黄昏,一个晚上。有时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那里,发呆,冥想,无所用心,无所事事……毋宁说这也是一种放空自己的最好的方式。

有人造访也是好的,尽管知堂老人警告说,自家的书房是不可给人家看的,因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怕被人看去自己的心事。但毕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好东西就要与人分享——试想,有朋自远方来,一边欣赏藏书,一边促膝交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不亦乐乎。人生中确有许多情感和灵感的火花,都是在与同类的交流中点亮的,只是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所以我更多的还是在阅读中寻找同类,有时也会在阅读中遇到一些和我一样的爱书人,就像久别逢知己,他乡遇故知,同样是很快乐的事情。

事实上,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隐秘世界,既可以安置肉身,也可以安置灵魂,我觉得一个最理想的隐秘世界莫过于书房。成都诗人小安在一首小诗《好的孤独》中这样写道:“再没有什么可写的,我回想我的生活,孤独占据了太多的时间,那些好的孤独,令一切可以回忆。”对于我来说,最好的孤独,一定在书房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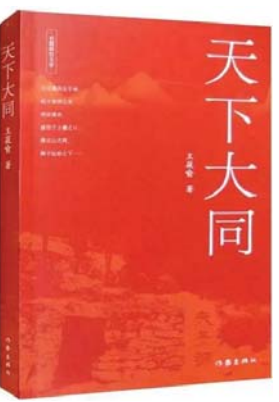
读书札记

□马兵

王筱喻的《天下大同》,由点及面,以小见大,兼具历史纵深和现实关怀地展示了儒学发源地山东贯彻“两个结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双创”的诸多实绩,记录了数位矢志不渝扎根大地的当代儒者,呈现了新乡土儒学的发荣滋长,是一部立意高远、取材别致的报告文学。不过,作者在写作时并不自囿于报告文学的文体界限,其打破时空、形散神聚、思路纷纭、跳跃性强的写法,让其带有很强的思想札记色彩。

作者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的角度,体现了对儒学之当代命运的思考。《天下大同》的“天部”每一章的开始,都有一个“历史镜头”:第一章是孔子慨叹不复梦周公,第二章是梁漱溟在邹平展开乡村建设的情境,第三章是韩愈流放著《原道》。这些“历史镜头”不但赋予了作品内在的历史坐标,更重要的是,它还代表了作者对儒学以仁学为核心的哲学智慧,及其在现实层面价值的深刻体认。在行文中,作者多次反思20世纪以“批孔”为核心的文化批判的片面性。不可否认,孔子思想距今已两千余

赓续正脉,其命维新



《天下大同》
王筱喻 著
作家出版社

年,且在漫长的阐释过程中,融入不少有悖于孔学初衷的内容,在历史的现代转型中起过消极作用;但同样难以否认的是,孔子思想中包蕴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其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人类生存的悠远的人文关怀和伦理思辨,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建设,乃至世界性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建构中,自有其无与伦比的意义。《天下大同》三个历史镜头所定格的一瞬间,固然有着巨大的沧桑感,但也彰显了一种百折不挠

的文化主体性,正是这一文化主体性,保证了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而不中断。

作者突出了儒学的实践性及于当下的意义。《天下大同》一面从“道统”的意义上阐释儒学复兴的必然和必要,另一面则聚焦许嘉璐、杨朝明、赵法生、高述群、王学典、杜泽逊、王殿卿、颜炳罡、刘示范、郭齐勇等致力推行儒学的学者和官员,借以展现儒学在当代公共实践层面的扎实修为,也展现了当代文化建设中儒学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所谓“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儒学素有关注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和实践行为的诉求,强调人伦日用,重在躬行践履,可谓以“落地”的形式来“登峰”。学者杨念群在解释“儒学地域化”的概念时,曾指出,儒学富有魅力之处恰恰在于其具有解决实际世俗事务的能力,儒学在宋代以后出现了一个“地域化”的过程,“这种地方性的儒学并非完全是碎片化的,而是拥有一些共通的准则,但由于中国自古领土广大,儒学往往是在地区具体历史境况的格局下发挥其作用的,故带有地区性的指向”。齐鲁大地是儒学的发祥地和文化厚土,赵法生、颜炳罡等的实践既是向前贤致敬,也带

有鲜明的“地域化”特征,他们办书院、办讲堂、办论坛,以“咬牙做去”的勇毅,身体力行地激活儒学的道德实践能力,探索儒学在后乡土社会中修复底层伦理、重建家国天下观念的可能。

作者以“天地人和”谋篇立意,展现了对“第二个结合”之精髓要义的理解。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可枝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生命脉所在,是根和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天地人和”四字是这种结合传神而精到的诠释。“天”指儒学大道,“地”指尼山圣坛,“人”指当代士人,“和”指命运共同体,四部辐射广阔,形成互为彼此的牢固支撑。作者在每一部分展开时,或立足天命阐发,或立足与时俱进,保留大量的时代细节和个人感喟,提供了非常有见地的分析,从中喷涌而出的是一种中国人都能兴会的共同认知和情感,作者自言的“无私无畏,仗义执言”的写作宗旨也得到很好的贯彻。

康有为曾有“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之语,足见中国士人对“大同”之虔敬,在这个意义上,《天下大同》确是一部体现数代人“精神夙愿”的有品之作。